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列夫·托尔斯泰的 自然生命观研究

Study on Leo Tolstoy's Natural View of Life

张兴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的 自然生命观研究

Study on Leo Tolstoy's Natural View of Life

张兴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的自然生命观研究 / 张兴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2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627 - 4

I. ①列… II. ①张… III. ①托尔斯泰(Tolstoy Aleksey Nikolayevich, graf 1883—1945)—小说研究 IV. ①I512. 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182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晓鸿
责任编辑 熊 瑞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5 千字
定 价 5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五批《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 编委会及编辑部成员名单

(一) 编委会

主任：王京清

副主任：马援 张冠梓 俞家栋 夏文峰

秘书长：张国春 邱春雷 刘连军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卜宪群	方勇	王巍	王利明	王国刚	王建朗	邓纯东
史丹	刘伟	刘丹青	孙壮志	朱光磊	吴白乙	吴振武
张翼	张车伟	张世贤	张宇燕	张伯里	张星星	张顺洪
李平	李林	李永全	李向阳	李国强	杨光	杨忠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陈春声	卓新平	房宁	罗卫东
郑秉文	赵天晓	赵剑英	高洪	高培勇	曹卫东	曹宏举
黄平	朝戈金	谢地坤	谢红星	谢寿光	谢维和	裴长洪
潘家华	冀祥德	魏后凯				

(二) 编辑部（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任：张国春（兼）

副主任：刘丹华 曲建君 李晓琳 陈颖 薛万里

成员：王芳 王琪 刘杰 孙大伟 宋娜 苑淑娅 姚冬梅
郝丽 梅枚 章瑾

序 言

博士后制度在我国落地生根已逾30年，已经成为国家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30多年来，博士后制度对推动我国人事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培养了一批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自1986年1月开始招收第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起，截至目前，国家已累计招收14万余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已经出站的博士后大多成为各领域的科研骨干和学术带头人。这其中，已有50余位博士后当选两院院士；众多博士后入选各类人才计划，其中，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年入选率达34.36%，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入选率平均达21.04%，教育部“长江学者”入选率平均达10%左右。

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各设站单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完善体制机制，健全服务体系，推动博士后事业科学发展。这为我国博士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

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在内的所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工作者提出的殷切希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央直属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为充分调动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创新积极性，展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优秀成果，提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于2012年联合推出了《中国社会科学博士后文库》（以下简称《文库》），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择优出版博士后成果。经过多年的发展，《文库》已经成为集中、系统、全面反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优秀成果的高端学术平台，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逐年提高。

下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做好《文库》工作，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自觉肩负起新的时代使命，锐意创新、发奋进取。为此，需做到：

第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在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实践结合起来，愈来愈显示出更加强大的

生命力。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应该更加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继续把《文库》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宣传、展示、交流的平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二，逐步树立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回答时代命题、规划未来道路的使命。当前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愈发重视，尤其是提出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治国理政、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从2015年开始，中央已启动了国家高端智库的建设，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针对性要求，也为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文库》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的博士后征集优秀成果，入选出版的著作也代表了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因此，要善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大智库功能与《文库》的小智库功能结合起来，进而以智库意识推动品牌意识建设，最终树立《文库》的智库意识和品牌意识。

第三，积极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里问题的实质，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缺失和建设问

题。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然是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和学科等组成。这一切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而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参考我们民族特质、历史智慧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吸纳儒、释、道、墨、名、法、农、杂、兵等各家学说的精髓，无疑是保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重要保证。换言之，不能站在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立场搞研究。要通过《文库》积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一方面，要以中国自己的实践为研究定位，围绕中国自己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努力探索具备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在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方面，不断加强和深化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衷心希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后工作者和博士后们，以《文库》系列著作的出版为契机，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根本遵循，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时代的需求结合起来，将自身的研究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的召唤结合起来，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功立言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征程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是为序。

王东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主任

2016年12月1日

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

(代序)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座巍巍高山,他为俄国和世界文学留下了丰饶的遗产,同时也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人工”的文学丰碑。迄今,在世人心目中,托尔斯泰与歌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马尔克斯等伟大的文学家一样,成了一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和文化符号。

但托尔斯泰的精神遗产是多面的。他不独创作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等闻名于世的文学长编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而且也写出了《忏悔录》、《我的信仰何在?》、《论生命》、《天国在你心中》等在俄国思想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不过后者这些政论作品在国内尚少有人知晓,在学界也鲜有研究。其实,在一生当中,托尔斯泰在文学写作这片园地不辍耕耘的同时,亦对宗教、哲学、教育、美学、社会等问题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伦理思想大厦。因此,托尔斯泰作为思想家的身份认同,一方面同一些文学大家一样,缘于其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与那些同被称为思想家的文学家相比,托尔斯泰则是著作等身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对人本身的认识及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可以说,是思想家托尔斯泰道德学说的核心。别尔嘉耶夫曾表示,在对人的本质理解方面,托尔斯泰与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并肩,他们比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贡献更

大。相较于别尔嘉耶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则从文艺学的角度论及托尔斯泰早年创作的特点，认为“心灵辩证法”和“道德感情坦率无隐的真诚”为托尔斯泰的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貌。事易时移，虽然车氏的文艺思想时下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昔日耀眼的光环，但他对托尔斯泰早年创作特征的独到概括仍以其远见卓识的才具和敏锐的洞察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论断时至今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心灵辩证法”可谓托翁写人摹情的“方法论”，而“道德感情坦率无隐的真诚”则反映了作家知人论世的价值观。两者彼此结合，相得益彰，为托翁笔下人物的形象体系和作品题旨的建构确立了一种导向。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中，除了性格情态各异的人物，更有林林总总的社会场景。通常而言，作家对有道德追求或者自身充溢自然善的人往往持正面评价态度，但对大小战争、沙龙活动、法庭审判、宗教事务等“人事”则充满嘲讽和抨击口吻。这缘于作家认为“人世间的斗争是卑鄙的”观念。由之，作家不仅在文学文本，也在其政论创作中对人们的各种肉体欲望、邪念和迷信观念等从不吝嗇批判文字。可以说，托翁正是基于其“道德感情坦率无隐的真诚”，表达了对理想人格的设想及对美好社会的期望。这种褒贬臧否的态度，所反映的是作家知人论世的“道德准则”，这一德性伦理观则是托翁对人本身思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托尔斯泰认为，人是“拥有精神意识的存在物”，我们生命的本原存在于爱中，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法则。换句话说，人的本质体现在爱这一精神本原之中，身上没有爱，便没有了真正的生命。同时他也认为，人人同一灵魂，亦即人人在精神层面上都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人没有支配他人的权利。显见，托翁对人本身的认识乃为一种“唯物”而非唯神的思想，它无疑是对教会千百年来所灌输的人的观念的反拨。

“道德自我完善”是托尔斯泰“人学”中所倡导的一种积极的行为伦理。它近似于我们古语所谈及的“见贤思齐、反躬自省”，但托尔斯泰把道德自我完善看作一个人的应然行为，而与外在各种力量的推动无关。托尔斯泰秉持人性本善思想，不过他认为这种原初的善只出现在一个人的童年，随着人进入社会，被文化，则其会逐渐习染由社会所带来的恶，所以人要祛除自身的恶，向生命的神性即完美、完善回归，这是一种生命渐近线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虽然任何人都无法达到这种完美，但他应为之做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完美，这样才能实现其人生的意

义和价值，并获得生命的不朽。

有关生命意义或者幸福观的问题，托尔斯泰在其不同时期的文章中着墨相当多。他曾在《忏悔录》中发问：“在这无限的世界中我这有限的存在有什么意义？”作家对这一设问的思考耗费了一生的光阴。托翁认为，人们活着需要宗教信仰，只有在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可能性。但这种宗教信仰不是对某一教会（基督教会等）的皈依。托翁曾以《谢尔盖神父》为例，说明真正的信仰并不需要教会这一中介，它并不能为信仰者带来灵魂的救赎。在托翁看来，宗教信仰是对人类生命意义的认识，它“赋予人的有限存在以永恒的意义”。托翁认为，人的肉体生命是会死的，但肉体的死亡并不表示生命的中断，因为人的灵魂生命是不灭的，人应当在有限的肉体生命中追求灵魂生命，以获得生命的不朽，其途径就是爱他人、爱上帝（此上帝为托翁从基督教中上帝观念化身而出的同名称谓，是具有至善完美意象的精神本体——作者注）：“如果人能够把自己的幸福置放到他人的幸福中，就是说爱他人胜过爱自己，那么死亡对他而言就不再是生命和幸福的终结。”不难看出，在这里，托尔斯泰以一种大胆质疑的勇气和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通过对宗教信仰、上帝等观念的再诠释，借助爱的观念阐发了其幸福观和人生价值观。

一

虽然思想家托尔斯泰的一些学说总被人们冠之以空想，但他从来不是空谈家，他的每一个思想的提出，都是对身边生活和现实社会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并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尤其是如此。在这一思想当中，“平民化”和“不以暴力抗恶”的观念影响了几代人，并且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人的思想意识中仍在发挥着作用。

时下在俄罗斯，人们谈及托尔斯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曾为“平民化”思想的倡导者。所谓“平民化”是指过一种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促使托尔斯泰萌生“平民化”思想的原因在于其对俄国农民的认识。托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乡下庄园度过，平时与农民往来密切，他也曾自述其世界观深受两位俄国农民的影响。托翁曾表示：“创造生活的劳动人民的

行动在我看来是唯一真正的事业。我明白了，这种生活所具有的意义是真理。”所以，在生命的后半期，托翁一直以农民的生活方式要求自己。另外，托尔斯泰倡导“平民化”思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认为贵族和富有的上层人士不劳而获，缺乏爱心，他们过的是一种不正当的、毫无道德的寄生生活，这也正是靠双手养活自己的农民在精神和道德上高于有闲阶层的。托翁在《安娜·卡列宁娜》中曾谈及康斯坦丁·列文：“他始终觉得他自己的富裕和农民的贫困相比之下是不公平的，现在他下决心为了使自己心安起见，虽然他过去很勤劳而且生活过得并不奢侈，但是他以后要更勤劳，而且要自奉更俭朴。”这种情形其实也是托翁本人的真实写照。

不难看出，“平民化”是托尔斯泰在追求自身生命意义过程中的一种探索，他进而把它作为一种生命意义的普遍价值而加以倡导。由于托翁在俄国社会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演化为了一场平民化运动。在托翁生前和身后，一些托尔斯泰主义的追随者按照托翁“去像农民一样，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呼吁，组织了一些“托尔斯泰垦殖队”和村社，但它们大都没有获得成功。不过时至今日，这一思想仍然在一些地区和国家发挥着影响。

“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为托翁学说中最负盛名的一种。它源出于圣经“不要与恶人作对”之语，不过托尔斯泰对之加以化用并赋予了更为丰赡的语意。在生前，托尔斯泰对其宣扬得最为用力，它是其在《我的信仰何在?》、《天国在你心中》、《基督教学说》和《暴力法则与爱的法则》等著名作品中集中阐发的思想。

学界也常将“不以暴力抗恶”称为“非暴力”。一直以来，人们总以为托翁宣扬的是不抗恶。事实恰好相反，托尔斯泰对各种形式的恶都深恶痛绝，并且也希望把它们消除殆尽。但是，一方面，他认为，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同时任何人在精神层面都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支配或者裁判他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指出，暴力就是“做那些被施以暴力的人所不喜欢的事情”，“任何一种暴力都是恶”，所以“不以暴力抗恶”就是不应以恶制恶。不过，虽然摒弃了“不以暴力”的方式“抗恶”，但人们仍然可以以“爱”为武器“抗恶”，这也是唯一所能采用的手段。托翁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感化的办法才能化暴力于无形，“化干戈为玉帛”，因为在他看来，“爱会唤起爱。

这一点绝不会改变，因为上帝在你的身上醒来之后，也会在另外的人身上唤醒自己”，所以即便是最为怙恶不悛、十恶不赦的人物，他内心中仍会保有善的情感，也能被感化，在托翁看来，这样便会防止无谓的牺牲和更多的流血，而“以暴制暴”则会制造更多的暴力和仇恨。

托尔斯泰把“不以暴力抗恶”看作一种绝对的法则。不抗恶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抗恶。这一法则所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对自然中的生命我们不应去伤害，在托翁看来，“‘不杀生’不仅指的是对人，而且指的是对一切有生命者”。对于别人带给自己的伤害，我们应当报以宽恕的心态。对于来自社会层面的恶（比如与暴力有关的一切组织形式），要努力不参与。对于这种“爱的法则”的成效，托翁寄希望于可以燎原的星火，他认为：“生活的理想，由人们的团结一致所构成。在现存秩序和生活理想之间，存在着无数的阶梯。人们只有逐渐地日益摆脱参与暴力、使用暴力和对暴力的习惯，才能近于这一理想。”

托尔斯泰的“不以暴力抗恶”思想，在作家的生前和身后，一直争议颇多。托尔斯泰自己也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性格特点，要真正走这一步是有困难的。可是这与个人义务毫不相干。问题不在于难易，而在于正确。在现代的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性格中，任何不能触动的或完全牢不可破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种社会制度和人的性格，是人的活动的结果，因此，只有人能够改变他们。我相信，应该改变它们，我正为此尽我所能”。事实上，众所周知，甘地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接得益于托翁的这一思想，并获得了成功；之后美国黑人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黑人运动同样也受到了托翁这一思想的影响。因此，托翁这一学说并不是一些人所理解的乌托邦。当今，人们对战争中屠戮行为异口同声的谴责，一些国家废除死刑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及各种环保组织的兴起等，总能多多少少窥见托翁这一思想中所呼吁、所宣扬的理念的影子，让人感觉到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仍然焕发着活力。

三

学界常把托尔斯泰的学说称为宗教哲学思想，看得出，宗教思想也是托尔斯泰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托翁的宗教思想与官方东正教会的宣传存在极大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抑或可以说托尔斯泰的“宗教”与后者并无相同之处。

托尔斯泰在他的《忏悔录》（1879—1882）中曾表示，“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作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作斋戒祈祷”。联系到托翁早年（1855）在日记中所述：“昨天关于上帝和信仰的谈话使我产生了一个及其伟大的思想，我自信能够以毕生的精力去实现这个思想，即创立一种与人类的发展相适应的新宗教，是剔除了盲目的信仰和神秘性的基督的宗教，是不应许来生幸福，却赐予现世幸福的实践的宗教。”可以看出，托翁在自我意识中与官方教会信仰的批判性对话出现得异乎常人的超前。

与早年有关对宗教的认识相一致，托尔斯泰在其《我的信仰何在？》中表示，任何宗教信仰都包含伦理思想和形上思想：前者所指的是有关人们生命的学说，即每个人和所有的人该如何生活；后者所谈的则是人们为什么应该这样生活。但是当今的教会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生命的学说，它“除了教堂、圣像、法衣和经文，什么都没有留下”。托翁通过教会在历史上斑斑劣迹阐明，虽然它“在口头上承认基督的学说，但在生活中却毫不掩饰地否定它”，所以托翁认为，官方教会所信守的一切已经与真正的基督教思想相背离。

阅读《复活》，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对官方东正教会的无情抨击。在小说中，他指出教会礼拜活动是“最大的渎神行径”，那些试图让人们相信法器、十字架等拥有神秘力量的教会仪式，“完全是一种骗局”。这种对官方教会所宣扬的神迹说的嘲讽和否定其实是托翁一直以来的立场。除了对宗教仪式的否定，托尔斯泰更对“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基督复活”等这些基督教信仰中的核心观念提出质疑。托尔斯泰明确表示，“任何一种宣扬靠赎罪和仪轨拯救的教会学说，都是与真正意义的基督教义格格不

入的”。真正的教会，托尔斯泰认为，“永远是一种内在的教会”，天国在你心中。而真正的信仰，“不在于礼仪，不在于牺牲”，也不在于记住何时斋戒、何时去教堂，而在于“并非一定在节日，而是永远让人在与所有人相爱之中保持善的生活，永远像希望他人待你那样去对待你的邻人”。

除了否定神迹说，托尔斯泰也否定官方教会的“上帝”观念。当然，官方教会中的上帝，在托尔斯泰看来，亦是神迹说中的一种。主教公会革除托尔斯泰教籍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认定其“否定上帝；否定我主耶稣基督；否定他为人类而忍受痛苦，为拯救人类死而复活”。何为真正的上帝？托尔斯泰认为，“上帝是一种精神”，上帝是至善、完美，是爱和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上帝，无需去别处寻找。“走近上帝只能靠善行，一个人越习惯于善的生活，就越会深入地了解上帝。”显而易见，这种对上帝的认识与官方教会宣传的同一观念已貌合神离，差之千里。

1901年，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在这年的二月，主教公会发布决议，革除托尔斯泰的教籍，使得托尔斯泰成为继俄国农民起义领袖叶梅利扬·布加乔夫（1775年）之后又一个在东正教会史上为数极少的被革除教籍的人。托尔斯泰在给主教公会的答复中用大量篇幅再次否定教会的神迹说，同时也清晰阐明了自己关于宗教的立场：“我信仰上帝；依照我的理解，上帝是一种精神，一种爱，是万物的基础。我相信我身上有他，他的身上有我。我认为把耶稣理解为一尊神，把他当作神来向他祈祷，是最严重的亵渎。”

其时，把闻名于世的作家托尔斯泰革除教籍，即便教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对托尔斯泰的同情者，而在这个绝大部分人都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托尔斯泰非但没有受到民众的声讨，反而声望更高，更受到拥戴，这在很大意义上说明托尔斯泰的学说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而官方教会的立场并不得人心。

四

当然，托尔斯泰的哲学伦理思想较为繁复，它们并不只是局限于前述的三个方面，即便在这些方面，我们也仅择其要者而述，并没有充分展

开。限于篇幅，我们也没有谈及作家的历史观、教育观，以及美学、文化思想等，它们同样为托尔斯泰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相关领域影响深远。

纵观托尔斯泰的一生，不拘成规、勇于质疑、挑战权威是为其典型的精神特征。他的《战争与和平》破除了盘踞人们意识当中的主流历史观，他的《哈吉·穆拉特》否定了高加索地区农民起义领袖的官方反面宣传，他的《安娜·卡列宁娜》则一反师法西欧文学的传统叙事模式，引领俄国文学以成熟的姿态走向世界。在社会生活中，他向“神权”、“政权”提出质疑，把“上帝”拉下神坛，把矛头指向社会不公，批判国家制度、不平等、私有制等人们习而不疑的观念。但托尔斯泰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家和理论家，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所“破”，更在于其所“立”。实质上，他破除旧意识的目的就在于确立新观念，后者汇集在一起就是今天的托尔斯泰主义，亦有称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思想抑或哲学伦理思想。

托尔斯泰生前在俄国，甚至在全世界拥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相对于末代沙皇，有人把他称为可以与后者比肩的俄罗斯思想界的沙皇。或正因为托尔斯泰思想为人们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冲击和震撼，西方学者斯宾格勒称其为革命家，当代俄罗斯哲学家侯赛因诺夫也认为，相较于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托尔斯泰的学说更具有革命性，“通常意义上的革命寻求人的地位、政权和所有权的变革，托尔斯泰的革命则聚焦于生活精神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它把化敌为友作为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或也恰好揭示了托尔斯泰哲学伦理思想的本质及其在俄罗斯思想史上的意义。

拙著原请一位自己所尊敬的师长作序，但因各种事情杂凑，商之老师较晚，后其又因琐事缠身，无法成文，而自己看着扉页后的“空白”，总觉得有些缺憾，只好不揣鄙陋，临阵捉刀，写下上述与本书并无直接关系的话，持论或失公允，敬祈学界专家、同道和读者不吝指正！

张兴宇

2016年8月

摘 要

“生命的自然性”这一看似陌生的概念，其实在中外哲学史上并不鲜见，且屡屡为一些哲学家所提出并倡导。这一概念所指的就是按照自然的方式去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按照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去生活。列夫·托尔斯泰本人在生活中便秉持这一生命观。在他看来，大自然是一种至善，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在人的身上同样具有完美和完善的本性，但这种完美只体现在人生的童年，人一旦进入社会，他身上的这种完美的本性会被逐渐地磨蚀掉，而随着这种本性善的流失，人也就慢慢地习染上由社会文明所带来的恶。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一生命观充分地反映在了其小说中，从而使之呈现出浓郁的自然生命主题。在其笔下，生命的自然性与大自然密切相关。受大自然的濡染熏陶，人的身心可以变得和谐自然，而且大自然也激发人们过一种远离恶的自然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与大自然接近与否，成为作家评判笔下人物的一种尺度。所以我们从作家小说中那些与大自然相接近的贵族女性身上，往往能看到这种生命的自然性。另外，作家在笔下也常常带着极大的好感反映俄罗斯的下层人民，他们主要是乡村农民，但也包括一些本身即为农民的士兵和贵族家庭中的奴仆。勤劳、质朴而又富有爱心是这些人物身上共同的精神质地。与那些和大自然相接近而洋溢着生命的自然性的贵族女性一样，托尔斯泰笔下的下层人民自身也往往更多地保有而非流失生来即有的、本性的善，所以我们把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这种生命的自然性特征称为自在自然。另外，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有一类人物形象，亦即“思想”的人物，他们时时